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2008年 第3卷 (4)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第3卷 (4)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大管理研究. 2008 年第 3 卷. 4/ 李新春主编.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58-7794-8

I. 中... II. 李... III. 企业管理 - 文集 IV. 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977 号

责任编辑: 文远怀 卢元孝

技术编辑: 潘泽新

中大管理研究 (2008 年第 3 卷 -4)

李新春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9.25 印张 165 000 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8-7794-8/F.7045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大管理研究》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工孟	上海交通大学
陈信元	上海财经大学
Michael Firth	香港岭南大学
黄俊英	高雄 中山大学
贾建民	香港中文大学
李维安	南开大学
刘常勇	高雄 中山大学
陆正飞	北京大学
毛蕴诗	广州 中山大学
钱共鸣	香港中文大学
Joachim Schwalbach	柏林洪堡大学
王重鸣	浙江大学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
吴世农	厦门大学
张 华	香港中文大学
赵曙明	南京大学



中大管理研究

2008 年 第 3 卷 (4)

主 编 李新春

副 主 编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李 勇 辛 宇 徐莉萍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兰 宇 李 勇 苏 琦 王海忠

辛 宇 徐东升 徐莉萍 张书军

目 录

- 1 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企业绩效分析
 高向飞 邹国庆
- 19 什么影响了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准确度?
 郑亚丽 蔡 祥
- 38 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黄志忠 白云霞
- 53 审计师变更的原因: 意见分歧
 涂国前
- 69 人口特征异质性对高管离职率的作用研究
 周 俊
- 84 我国管理学研究的统计功效分析
 林丹明 李炜文 梁 强
- 103 我国省域食品制造业竞争力评价
 曾利彬 严奉宪 周 斌 卢菲菲 邵 洁
- 127 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三级供应链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牛春阳 刘三阳
- 137 《中国会计学刊》征文启事

CONTENTS

- 1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irms of Northeast in China
Gao Xiangfei Zou Guoqing
- 19 What Influenced the Accuracy of Financial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Zheng Yali Cai Xiang
- 38 Equity Incentive and Agency Costs
Huang Zhizhong Bai Yunxia
- 53 The Reason of Auditor Change: Opinion Divergence
Tu Guoqian
- 69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Heterogeneity on Top Management Team's Turnover
Zhou Jun
- 84 A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
Lin Danming Li Weiwen Liang Qiang
- 103 Evaluation of Competence of 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s Provinces
Zeng Libin Yan Fengxian Zhou Bin Lu Feifei Shao Jie
- 127 Response to the Disruption of Three-Level Supply Chain with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Niu Chunyang Liu Sanyang
- 137 Call for Papers ——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企业绩效分析 ——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

高向飞 邹国庆^①

摘要：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分别基于社会关系和分权制度进行探讨。本文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将社会关系和正式制度微观化为企业的关系资本和制度资本，并进一步把关系资本细分为商业关系资本和政治关系资本，从而将宏观制度环境纳入到微观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中。实证研究采用基于残差正态分布的有序选择模型对东北地区 313 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商业关系资本与绩效水平和绩效增长均显著正相关；政治关系资本与绩效增长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制度资本与绩效水平呈二次曲线关系，而其与商业关系资本的综合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促进绩效增长。

关键词：制度环境、商业关系资本、政治关系资本、制度资本、企业绩效

JEL: D23, L14

^① 高向飞，博士，吉林大学商学院；邹国庆，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商学院。在此对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周闯博士、黄卫挺博士和陈艺妮博士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令世界瞩目。然而,这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竟发生在政府与市场共同配置资源的转型经济条件下,无疑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相违背。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大大激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大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社会资本理论,借鉴社会关系网络对问题做出解释(Boisot 和 Child, 1996; Xin 和 Pearce, 1996);也有一些学者从转型经济下特殊的制度安排入手,采用制度主义的观点进行论证(Nee, 1992; Walder, 1995)。实际上,中国社会对于人情关系的推崇,使得源于关系、情面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维系社会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耀基, 1993);同时,转型经济中政府对于市场配置的政策干预同样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特殊的正式制度安排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Nee 和 Su, 1990; Qian 和 Weingast, 1997)。因此,制度环境是研究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思想,从源于社会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和人为设定的正式制度安排两个角度全面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注重分析两种制度安排的综合效应,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 制度环境的构成与资本化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戴维斯、诺斯, 1994),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North, 1994)。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尽管在形成方式、作用机制、变迁路径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正式制度能够贯彻和增进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修正或替代非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则会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发挥约束作用,以减少不确定性并为组织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Ellickson, 1991; North, 1990)。在中国制度转型时期,正式规则和法律体系尚不健全(Redding, 1990; Peng 和 Heath, 1996),产权不明晰(Boisot 和 Child, 1996; Clarke, 1991),政策环境缺乏稳定性(Park 和 Luo, 2001; Xin 和 Pearce 1996),非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正式制度发挥作用(Xin 和 Pearce, 1996)。非正式制度源于社会网络(Peng, 2004),而其执行机制则依赖于现行的社会关系(Nee 和 Ingram, 1998)。根植于悠久文化传统的人情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表现形式,充斥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层面,自发控制和协调个人间和组织间的互动。人情关系所蕴含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已经完全内化于人们心中,成为理所当然的规则(taken-for-granted rules)。换言之,人情关系已经被加以制度化,成为一种非正式的行为约束,本文称其为关系约束。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本着功利主义思想,过于低度社会化人类行动,将市场行动者孤立于制度环境之外。嵌入理论的引入(Granovetter, 1985),使得社会关系成为影响行动者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受到关系约束的同时,也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并承担较低的交易成本,这显然有利于提升行动者的绩效。鉴于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现出的价值属性符合资本的泛化定义,社会学家率先将其进行资本化界定(Bourdieu, 1980; Coleman, 1988),进而社会资本理论被提出并迅速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青睐。然而,由于学术领域和研究目的的差异,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部分学者甚至有意将正式制度安排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Fukuyama, 1995; Lin, 2001; Putnam, 1993),Krishna (2000)则公开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进行分析,这意味着正式制度同样可以被资本化,但是否属于社会资本范畴仍需进一步探讨。从正式制度的定义角度看,其与非正式制度均为一系列规则和标准,并且二者互为补充、紧密联系。如果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被资本化,正式制度安排同样也可以进行资本化;从正式制度的功能角度看,其有效性体现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上,完全具备泛化资本的生产性功能。仅凭以上两点似乎仍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现有嵌入理论尚缺乏制度与经济行为之间关联的纽带。Oliver (1996)的工作令人振奋,他提出的制度嵌入观点

有效地弥补和完善了嵌入理论，为制度环境的资本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本文将资本化的非正式制度称为关系资本，而将资本化的正式制度称为制度资本，以突出两种制度安排的特性。

（二）关系资本与企业绩效

源于人情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Redding (1990) 认为在法律和规则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家的人际关系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Xin 和 Pearce (1996) 分类别对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证实：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家认为人情关系在企业发展中最为重要，更倾向于和政府部门建立广泛的关系。Peng 和 Heath (1996) 以企业成长的战略选择为主旨，对制度环境与企业成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结论认为：以人情关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促进企业成长。Luo 和 Chen (1997) 从企业战略角度对人情关系和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企业战略对企业的效率和成长具有复杂的正向影响。Peng 和 Luo (2000) 则分别从企业家之间和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两个角度，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家人际关系和宏观组织绩效进行考察，认为企业家人际关系是企业绩效的必要非充分条件。Park 和 Luo (2001) 基于制度、战略和组织因素构建人情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进而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总体上讲，人情关系可以提高企业绩效，但对销售增长的贡献有限，对利润增长的影响也不明显。Li, Poppo 和 Zhou (2008) 则比较研究了国内企业和外商企业在人情关系利用上的功效差别：对于国内企业而言，人情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单调正向影响；而外商企业情况不同，人情关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曲线关系。另有一些学者主要通过企业家的任职经历来衡量企业家的人际关系，其结论均支持人情关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命题（边燕杰、丘海雄，2000；石军伟、胡立君、付海艳，2007；邹国庆、高向飞，2008）。综合上述研究：企业家的人际关系包括企业家之间的商业关系和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政治关系两种类型，其中后者为主要形式。企业家的商业关系可以促进组织间知识学习和信息交流，无论对于提高企业绩效水平还是促进绩效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家的政治关系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则存在分歧。在中国转型时期，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基本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而大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稀缺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边燕杰、丘海雄，2000），所以政治关系资本显得尤为重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并

促进绩效增长,但随着关系的密切程度不断加深,企业家会更多地依赖政府扶持而逐渐丧失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由此导致政治关系资本束缚企业发展,对企业绩效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人情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资源的获得往往以高额的回扣和贵重的礼品作为代价,与此同时,资源的收益也往往会达到超乎寻常的水平。因此,关系资本的功效实际上主要表现为资源获取,而对于节约交易费用收效甚微,甚至表现为消极作用。

假设 1a 商业关系资本与企业绩效水平正相关

假设 1b 商业关系资本与企业绩效增长正相关

假设 2a 政治关系资本与企业绩效水平正相关

假设 2b 政治关系资本与企业绩效增长之间呈倒 U 型的二次曲线关系

(三) 制度资本与企业绩效

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公有制,其二是渐进式改革,这与东欧及前苏联的转型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Walder, 1995)。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产权公有制导致产权不明晰,进而损害经济效率(Peng 和 Heath, 1996; Xin 和 Pearce 1996),并导致私营企业融资困难(Nee, 1992)。同时,产权不明晰造成以产权为基础的合法性框架缺乏,无法构建完善透明的市场法规(Peng 和 Heath, 1996; Peng 和 Luo, 2000),促使机会主义滋生。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商业法规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使得政策环境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大大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Park 和 Luo, 2001; Peng 和 Heath, 1996; Xin 和 Pearce, 1996)。不可否认,以上制度缺陷及其引发的各类经济问题确实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但转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某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尚未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 1978 年,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效率(Li, 2004)。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分权改革措施:“财政分权”改革打破了以往的税收分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参与市场活动的积极性;“企业下放”制度则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充分实现了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被当作企业看待(Walder, 1995)。Nee (1992) 通过对混合结构组织进行深入剖析,合理地解释了经济效率的由来。他主要以转型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集体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分权和企业下放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与所辖集体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松

散治理结构，称之为混合结构组织（marketized firm），该组织通过地方政府的保护措施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成本，弥补市场制度的缺陷。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加，混合结构组织的交易成本会不断上升并逐渐失去成本优势。此外，混合结构组织的弹性机制能够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组织的效率和持续性。地方政府在税收的激励下，将权力进一步下放到所辖企业以提高其营利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家获得了明确的收益索取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私有化产权（Li 等，2000；Nee 和 Su，1990）。Li（2004）认为分权改革是塑造政府和市场角色的驱动力，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和特殊的产权私有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绩效水平。因此，Nee（1992）指出：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隐藏着一种新型市场化交易体系，其微观主体是混合结构组织。这种新型的市场化交易体系建构在特殊的正式制度安排基础之上，充分体现了效率原则，有效地弥补了市场规制的缺陷和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综合上述观点，分权制度安排促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结成紧密的关系网络，从而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频繁互动会造成企业与政府的制度趋同，导致企业效率更多的被仪式性定义所决定，而逐渐偏离生产性功能基础（Meyer 和 Rowan，1977）。在制度趋同的过程中，官僚成本和仪式化程序会加速生产效率的损失，若将生产效率的损失视为企业的某种成本，则这种成本应该具有边际递增的性质。随着分权制度改革的推广和深化，企业绩效会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促进下持续上升，但效率损失的逐渐凸现将使得企业绩效的增长速度不断降低并最终减少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

假设 3a 制度资本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呈倒 U 型的二次曲线关系

假设 3b 制度资本与企业绩效增长负相关

（四）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

现有研究已经分别对中国的人情关系（Boisot 和 Child，1996；Park 和 Luo，2001；Xin 和 Pearce，1996）和分权制度（Li 等，2000；Li，2004；Nee 和 Su，1990；Nee，1992）在资源获取、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论证，但关系资本和制度资本的综合效用，即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有待检验。基于假设 1a、假设 2a 和假设 3a，考虑到分权制度改革的推广和深化程度有限，对企业绩效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较小，我们进一步提出假设：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水平呈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基于假设 1b、假设 2b 和假设 3b，我们无法进一步做出统一的假设，这取决

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作用效果的强弱比较。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历史传承、行为习俗的突出强调严重制约着经济转型的步伐,尽管目前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但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计划经济的色彩依然比较浓重,源于人情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关系资本对企业绩效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制度资本的阻碍作用,制度环境总体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效率损失的逐渐凸现,制度资本的阻碍作用会不断增强,而且政治关系资本最终也会表现出其消极的一面,从而导致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假设 4a 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

假设 4b 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增长之间呈倒 U 型的二次曲线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东北三省企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内转型经济特征较为明显,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措施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显著,切合本文的理论构建。此外,东北地区受传统风俗习惯束缚程度高,人情关系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社会关系变量的测量,提高假设检验的显著性。样本选择符合以下标准:1. 非银行类企业;2. 企业连续经营三年以上;3. 企业的正式员工数量在五十人以上;4. 企业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行业范围仅剔除了银行类企业,因为银行本身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主体,与政府的关联性较强,不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要求企业连续经营三年以上是为了保证企业资料的连续性和真实性,同时能够反映企业绩效的增长情况。企业规模是地方政府对所辖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和保护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规模过小,对地方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就不明显,从而也无法对地方政府干预形成有效的激励。将企业的业务范围限定在省内可以明确界定制度环境的边界,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对于企业的性质本文不作限定,以保证样本的多样性和结论的适用性。

我们在问卷的开始部分郑重承诺本次调查仅用于学术研究，绝不会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如果受访者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本次研究整体层面的结论。问卷由三个量表构成，分别为关系资本量表、制度资本量表和企业绩效量表。关系资本量表沿用 Li、Poppo 和 Zhou (2008) 测量企业家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题项，由于访谈对象存在差异，我们在语言表述上稍作了调整。企业绩效的客观数据在收集过程中困难重重，大部分企业将其视为商业机密不愿透露，因此我们改用主观态度变量进行衡量，题项设置借鉴 Li 和 Atuahene-Gima (2001) 的表述方式。制度资本的测量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所采用的量表也因为研究目的不同具有很大差异，这些都增加了量表开发的难度。我们依据国内学者认可程度较高的相关定义和衡量标准（胡曙光、陈启杰，2002；李怀，1999），结合本文的核心思想，尝试开发了相关题项。我们为此充分征求了校内相关教授和部分企业家的意见，并对题项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问卷发放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其中前两种方式作为本次研究的预测试，较正式发放提前一个月时间：1. 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发放问卷，将问卷交给少数在企业管理层的亲友，由他们负责进一步下发给他们在其他企业任职的亲友，以此类推，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问卷 87 份，其中有效问卷 32 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为 87%和 32%；2. 通过在企业家协会网站获得的企业电子邮箱地址，用 E-mail 发放电子问卷，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95 份，其中有效问卷 73 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为 31.7%和 24.3%；3. 通过对吉林大学 MBA、EMBA 和高级经理人培训班学员进行调查访问，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问卷 261 份，其中有效问卷 208 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为 43.5%和 34.7%。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 443 份，有效问卷 313 份，总体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为 44.3%和 31.3%。

（二）变量测量

本文沿用 Li、Poppo 和 Zhou (2008) 的测量方法，将关系资本分为商业关系资本和政治关系资本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制度资本主要从其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的功能角度进行测量。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Likert) 5 点量表进行量化，数字 1-5 分别表示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为提高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我们采用前期有效问卷共计 105 份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以删除不合格的题项，我们将在下面的变量介绍中做出具体说明。

1. 因变量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金融和战略两类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测量, 量化方式以客观数据为主。Li 等 (2008) 仅采用单一金融指标 ROA 衡量企业绩效, Peng 和 Luo (2000) 则进一步增加了战略指标, 使用 ROA 和市场份额共同衡量企业绩效, Li (2004) 认为传统的测量指标 ROA 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劳动生产率适合于作为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此外, 相关研究中也并不乏采用主观评价量化企业绩效的方式, Wu 和 Leung (2005) 通过五点态度量表对销售增长和 ROI 进行量化, 以测量企业总体绩效。鉴于企业客观财务指标涉及商业机密, 本文从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增长两个方面综合评价企业绩效, 分别采用企业在行业内的相对盈利水平, 企业在行业内的相对收入水平, 企业在行业内的相对盈利增长, 企业在行业内的相对收入增长进行主观测量。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行业差异和企业规模不同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减少使用控制变量。

2. 自变量

商业关系资本包括三个题项, 分别用来测量企业家与上游企业、下游企业和竞争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密切程度。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我们发现企业家与上游企业、竞争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密切程度因子载荷较高, 分别达到 0.6 和 0.8, 而企业家与下游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密切程度因子载荷不足 0.1。此外, 如果剔除该项, Cronbach's Alpha 系数将上升到 0.7, 说明该项与其它题项相关性较低, 故将该项剔除, 企业家商业关系的 Alpha 值提高为 0.7。政治关系资本包括三个题项, 分别用来测量企业家与各级人民政府、产业监管机构和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关系密切程度。三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较高, 分别为 0.6、0.9 和 0.8。企业家政治关系的 Alpha 值为 0.8, 说明该变量的信度水平较高, 故保留全部题项。

在制度转型条件下, 可以从多个维度考察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如正式制度规则的缺失 (Khanna 和 Palepu, 2000), 政府对资源的控制 (Child 和 Lu, 1996), 政府对企业运营的干预 (Ahlstrom 等, 2000)。Peng 和 Zhou (2005) 专注于亚洲制度转型, 选取政府控制稀缺资源的程度, 政府干预企业经营和决策的程度, 政策的不连续性程度三个维度衡量正式制度的影响。分权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正式制度安排, 除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外, 还注重经济效率的培育。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效率因素引入制度资本的测量题项中, 分别从资源利用效率、机会主义、交易成本和政策连续性四个方面设置题项。经过检验, 四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较高, 分别达到 0.7、

0.8、0.9 和 0.8。通过信度检验，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说明该变量的信度水平较高，故保留全部题项。

3. 控制变量

企业导向包括三个题项，分别为创新导向、企业家精神和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创新导向和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两项因子载荷较高，分别为 0.7 和 0.8，但企业家精神仅为 0.2，而且删除该项后 Cronbach's Alpha 值可以上升到 0.7，故剔除该题项，企业导向的信度系数达到 0.7。

剔除不合格的题项后，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Alpha 值超过 0.7，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运用 SPSS11.0 对剩余题项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方式的主成分分析法并将特征值大于 1 作为因子提取标准。结果显示：KMO 值为 0.616，Bartlett's 检验的 P 值为 0，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都超过 0.6，并且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73%，如表 1 所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运用 AMOS4.0 对全部样本共计 313 份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量表的效度。从结构方程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全部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 0.7 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模型的拟合效果如表 2 所示，GFI、AGFI、NFI、NNFI、CFI、IFI 均达到 0.9 的标准，这充分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表 1 关系资本、制度资本与企业导向各题项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结果

题 项	描述性统计		因子分析结果			
	均值	标准差	商业关系 资本	政治关系 资本	制度 资本	企业 导向
企业家与上游企业的关系	3.865	0.673	0.898			
企业家与竞争企业的关系	3.405	0.985	0.645			
企业家与各级人民政府的关系	3.757	0.830		0.748		
企业家与产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3.649	0.978		0.878		
企业家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关系	3.973	0.833		0.843		
资源利用效率	2.784	0.917			0.669	
降低机会主义	2.216	1.003			0.782	
减少交易成本	3.000	0.849			0.868	
政策连续性	3.432	1.015			0.755	
创新导向	3.432	0.959				0.768
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	4.054	0.911				0.788
累积方差贡献率%			13.715	33.912	56.058	73.049